南朝梁代设立相如县的历史文化意义

熊 伟 业

(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,成都 610064;四川文理学院 中文系,四川 达州 635006)

摘要:蓬安县为古代相如县地域,其命名为"相如县",是因司马相如有故宅在县境,这个史实有着众多史籍记载证实。这与《史记》记载司马相如"蜀郡成都人"之间的矛盾,是由于对籍属理解的时代差异所致。南朝梁代始设相如县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,主要在于南北军事对峙、文化争衡导致相如县设置及其命名具有巩固边境、夸耀文章诗赋、激励地方人士等多种意义。

关键词:梁代;相如县;司马相如

中图分类号:I206.2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08)03-0128-07

近年由蓬安学者邓郁章等先生首先提出并探索"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"的问题[1],考证"相如县"与司马相如的关系,后又经多位学者研究,取得了很大进展。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就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不载"司马相如生于巴郡安汉县"和"南朝梁代设立相如县的原因"这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。

蓬安县为古代相如县地域,相如县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六年(507 年),是因为古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有"故宅、别业"在此地而取为新设县名。从现存典籍来看,这个史实首先载于《隋书·地理志》"巴西郡"[2]824,其后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以及唐宋以来各种古今历史地理著作多有记载。

"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"与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记载"司马相如者,蜀郡成都人也,字长卿"[3]2999,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"司马相如字长卿,蜀郡成都人也"之间却存在矛盾[4]2529。《史》、《汉》也是最早记载司马相如籍贯的权威资料,自此以后到南朝梁代,史籍没有另外的不同记载。

一 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不载相如出生地的原因

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未曾提到相如与"巴郡安汉县"的关系,是因为材料、体例的限制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史籍的众多注解著作也未曾注意到这个问题。首先因为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史籍记载本身毫无疑问;其次在于这个问题本属偏僻,与司马相如研究的古代学术领域或关注点没有紧密联系,或者说没有出现合适的学术机会来讨论;再加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内容又浩如烟海,所以司马相如出身地被忽略就完全可以理解。《史》、《汉》不记司马相如祖先以及故里的原因,按李大明先生所论即是限于材料:"据刘知几的《史通》,司马相如有《自叙》之作,而司马迁作《司马相如列传》,即本于相如《自叙》。也就是说,司马相如自记为'蜀郡成都人',而司马迁照抄而已。……相如《自叙》之确定,不但有《隋书·刘炫传》的记载,而且刘知几所读到的《司马相如集》中确有其《自叙》,……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有'汉文园令司马相如集一卷'(两《唐志》著录为二卷),刘氏所读,盖此本也。"[5] 此论明确了两个问题:一、"司马相如者,蜀郡成都人也"来自相如《自叙》;二、相如《自叙》一直流传到唐代①。这两点就决定了司马相如故里在"巴郡安汉县"的事实不为

收稿日期:2007-10-26

作者简介:熊伟业(1963—),男,四川射洪人,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,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。

后人所共知。

问题首先在于司马相如何以不记“祖先所出”。按《隋书·刘炫传》云:“通人司马相如、扬子云、马季长、郑康成等,皆自叙风徽,传芳来叶。”[2]1722 又《史通·序传》云:“盖作者自叙,其流出于中古乎?按屈原《离骚经》,其首章上陈氏族,下列祖考;先述厥生,次显名字。自叙发迹,实基于此。降及司马相如,始以自叙为传。”[6]685册 这类自叙,从司马相如开始兴起,或者说隋唐时期能看到的自叙以司马相如为最早,既然如此,最早的自叙没有成例参照,体例内容和后来居上的自叙比较自然会有些不周全:“然其所叙者,但记自少及长,立身行事而已。逮于祖先所出,则蔑尔无闻。”[6]685册 这“祖先所出,则蔑尔无闻”就是一个缺点。而《史记》所载人物,也多有“祖先所出,则蔑尔无闻”的。《史记》之前的史籍对人物籍贯、祖先并不在意,所以在司马迁之前的司马相如时代,“自叙”中也许本来就不必交待“祖先所出”。稍后司马迁、扬雄的《自序》对“祖先所出”就比较详细,是文体和时代发展的结果,也有赖于所掌握资料的完备。

门阀氏族制度化之前,对于籍贯的理解和此后当有区别。特别是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西汉,祖籍、祖先未必会带来现实利益,荣耀之感远不如南朝隋唐那么强烈,祖籍、出生地大约还从属于户籍,而东汉以来至隋唐,对籍属的确定除习惯外,还加上了个人认同的因素,更不完全是出生地的反映。《史记》所载人物祖先一般都是有可称道者或奇异者,才会着笔,也才能够着笔。如刘邦、张耳、陈馀,淮阴侯韩信,丞相萧何、陈平、张苍等人祖先皆未提及,而这些人发迹之前皆或微或贱,想见其祖先也无可称述,所以司马相如“祖先所出,则蔑尔无闻”,就不足为奇。屈原、司马迁、扬雄的祖先皆非常人,自有光彩,司马相如的祖先或者就是平民,也无曲折惊奇事迹可叙。“故其亲名之曰犬子”,即透露着相如父祖身份修养的某些信息。

其次当是相如《自叙》就说他自己是成都人,这与西汉时代对故里、籍贯等的认识有关。汉代“编户齐民”是基本制度,丞相尚不能免:“汉代身为丞相,只要没有封侯,就是平民身份。虽宰相之事,也要服徭役,与编户齐民等。”[7] 所以“户籍”意识很强,在何处编户,就是何处人,“户籍”所载是登记的依据,也就是“籍贯”的本义,这在出土汉简中可以验证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尚无“籍贯”这一词语,而“籍贯”还不一定是故乡的意思,“蜀郡成都”指家业所在地,“巴郡安汉”指出生地,而家业所在地更为重要。

《史记》“司马相如者,蜀郡成都人也”的记载影响巨大,而成都也是司马相如主要活动地点之一。但《史记》的这个记载并非一定是指司马相如的出生地、祖居地,或者说“蜀郡成都”的说法并不一定是指司马相如的故里。

《史记》作为历史著作,对籍贯记载的要求当然比较深入,而且时代较晚,司马迁自然比司马相如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要完备。但《史记》因资料的详略,体例并不统一。所载人物有的就没有籍属,如“阳陵侯傅宽,以魏五大夫骑将从,为舍人,起横阳”,“信武侯靳歙,以中涓从,起宛朐”;有的只是泛言“楚人”,如“陆贾者,楚人也”;有的就很详尽甚至写到乡、里,如“陈丞相平者,阳武户牖乡人也”,“沛丰邑中阳里人,姓刘氏”,“老子者,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”[3]2707,2709,2697,2051,341,2139;还有的写到祖先所出,迁徙变动的情况等等。“司马相如者,蜀郡成都人也”,是《史记》的一般格式,并不详细,有更多信息被忽略。比如编户地的可能的变迁等信息就没有反映。“蜀郡成都”并不一定就是司马相如的出生地,而出生地也并不一定就是后来的编户地,这在《史记》人物所属地域记载中存在不止一处。

如云“冯唐者,其大父赵人,父徙代,汉兴徙安陵”[3]2757。冯唐究竟是何处人氏?至少确知“安陵”必非其出生地。以司马迁本人来说,出生地和编户地就是两个概念。当然多是合二为一,但也有不少分别的例子:说到出生地,并未提到编户地,而需要说明编户地时,也不一定同时指出出生地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:“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。”[3]3293 而“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”句下《索隐》引《博物志》却说“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,年二十八,三年六月乙卯除,六百石”[3]3296②。按此处的意思,也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“右扶风茂陵人”,即“右扶风茂陵显武里”是司马迁当时编户所在地,“龙门、河山之阳”是司马迁出生地、故里,而《太史公自序》则并未提到“右扶风茂陵显武里”。

又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所载吕不韦的籍贯就和《战国策》所载不同,其中“阳翟、濮阳”的差异和“成都、蓬安”的差异如出一辙:“‘吕不韦者,阳翟

大贾人也。'《索隐》注阳翟:'(翟)音狄,俗又音宅。《地理志》县名,属颍川。按:《战国策》以不韦为濮阳人,又记其事迹亦多,与此传不同。班固虽云太史公采战国策,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,故不全依彼说。或者刘向定《战国策》时,以己异闻改彼书,遂令不与《史记》合也。'"[3]2505而《战国策·秦策》云:"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"[8]卷七,189,这与其说是刘向"以己异闻改彼书",不如说是吕不韦本身籍属有变动更为合理,亦即出身地与户籍地不一,太史公仅闻一端而载。又如孙子,《史记·孙子列传》:"孙子武者,齐人也"[3]2161,而《吴越春秋》云:"孙子者,名武,吴人也"[9]第463册,17,也是和吕不韦的籍贯同样的道理,完全可以看作是孙子居处籍属的变动。再如与司马迁同时的张汤,其祖先所出也未记载,而《汉书·张汤传赞》云:"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,而司马迁不言,故阙焉。"[4]2657同样地,关于司马相如籍属的这些"异闻",太史公也未能知晓。

因此,关于人物籍属记载的具体内容,《史记》并不统一,完全根据材料的多寡详略而载,所以"蜀郡成都"也不就是指司马相如的出生地、故里。至于其出生地、故里未记载,是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重要,而相如本人自序就未曾写入,太史公也就不知道。

《华阳国志·先贤士女总赞》云:"长卿彬彬,文为世矩。司马相如,字长卿,成都人也。"[10]712以《华阳国志》衡量,西汉以来至梁天监六年以前,"司马相如"为"巴郡安汉人"的历史不传于世。任乃强先生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·前言》云:"取材于扬雄《蜀本纪》,应劭《风俗通》,谯周《益州记》,陈寿《益部耆旧》,与扬雄、左思两《蜀都赋》、来敏《本蜀论》、赵宁《乡俗记》及常氏自所见闻,而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续汉书》、《汉纪》、《续汉纪》与陈寿、王崇《蜀书》之文参订之。其他所云司马相如、严君平,阳城子玄等之《蜀本纪》,皆既佚之书,则疑其或属虚记,或仅传闻,莫得而征之矣。按其《自序》所举,获见司马相如、严君平、扬雄、阳城衡、郑廑、尹贡、谯周、任熙八家《蜀本纪》,旁所引据复有何英、杨终、赵宁、王崇、陈术、祝龟、习凿齿、王隐、虞预、干宝之书,多有永和时已经散佚者。"[11]6可见以上诸书并没有记载这个问题,即常璩所见资料没有司马相如为"巴郡安汉人"的记载。东汉以来至梁,"安汉"所出当时名士甚众,司马相如出生于"安汉"的事实知者应当不少,不至湮灭。谯周为"巴西西充国"人、[12]蜀书·谯周传,1027;陈寿本为巴西安汉人:"陈寿字承祚,巴西安汉人也。少好学,师事同郡谯周"[13]陈寿传,2137。《华阳国志·后贤志》说"陈寿……锐精《史》、《汉》。……撰为《益部耆旧传十篇》。……又著《古国志》五十篇。"[10]849他们对司马相如的出生地问题应当了解,没有记载可能是这个问题不太重要,不必记载,或者因为体例笔法,不至记载。《史记》"司马相如者,蜀郡成都人也"的记载,与司马相如出生于"巴郡安汉县"之间,在陈寿等相如故里人看来也并非一定就是矛盾,也不必特意指正。

陈寿《益部耆旧传》、常璩《华阳国志》等囿于体例,除蜀主之类帝王将相外,于一般人士的出身居处之地不至细述。《华阳国志·先贤士女总赞上》云"言此四十三人也(注云四十二人)"[10]732,无一有迁徙记载。如《蜀志·成都县》条录"豪富"有"先有程郑",《华阳国志校注》注云:"程郑本临邛人,此列入成都籍,大约又在成都落户。"[10]238,240"郭玉,字通直,新都人也"[10]先贤士女总赞中,762,而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曰"郭玉者,广汉雒人也。"[14]2735可能是生于新都,后徙广汉,二书各取一端而已。又云"杨王孙,成固人也",《华阳国志校注》注引《西京杂记》云:"京兆人也。"[10]先贤士女总赞下,795,796《三国志·吴书·甘宁传》云:"甘宁字兴霸,巴郡临江人也。"而裴注引《吴书》曰:"宁本南阳人,其先客於巴郡。宁为吏举计掾,补蜀郡丞,顷之,弃官归家。"[12]1292《后汉书·栾巴传》:"栾巴字叔元,魏郡内黄人也。"而李贤注引《神仙传》云:"巴,蜀郡人也。少而学道,不修俗事。"[14]1841上举人士的籍属或出生地本有变动,但《华阳国志》等只取一点,应属体例所致,也有"博取约用,精练再三……又略于往古而详于当近"[11]前言,6的时代风格的原因。

《华阳国志》对王褒、张鲁籍属的记载最能说明问题。王褒,《汉书·王褒传》云:"王褒字子渊,蜀人也。"[4]2821而《华阳国志·先贤仕女总赞上》云:"王褒,字子渊,资中人也。"但《华阳国志》目录、赞俱又入"蜀郡士女",《僮约》云"资中男子"[10]713,而《圣主得贤臣颂》又云:"今臣辟在西蜀"[4]2822。若以"资中"而言,则不得称"西蜀",此"西蜀"当指其长期为益州刺史服务所居的成都而言。《华阳国志校注》此条注云:"《汉书》误;又本志亦应列入犍为人士,此处及卷十二《目录》皆误。"其实皆不为误,

这和司马迁既云“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”,又作“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”的道理一样,是户籍居处变迁的反映,也是不同场合、不同时期对籍属的不同理解。再如《三国志·魏书·张鲁传》云:“张鲁字公祺,沛国丰人也。祖父陵,客蜀,学道鹄鸣山中,造作道书以惑百姓,从受道者出五斗米,故世号米贼。陵死,子衡行其道。衡死,鲁复行之。”[12]1292张鲁自祖父起即迁居蜀,而此处尚归其祖籍“沛国丰”,则说明西汉以来迄东晋,对籍属的理解还未完全统一,但出生地与籍贯已渐渐分明,籍属的确定更多地是以习惯和个人认同为主。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诸注也都未曾注意到这些问题。

南朝以来,出身地与籍贯的区别,比较规范一致,而此前则未免混乱。如《梁书·武帝纪上》云:“高祖武皇帝,讳衍,字叔达,小字练儿,南兰陵中都里人(南兰陵,今江苏武进县境)……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(秣陵县今南京一带)。”[15]1籍贯与出生地分得很清楚。因此,《史记》以来自《华阳国志》不载司马相如出生地“安汉县”,根本原因在于对籍属问题的理解和后人不完全一致,比较简略,对祖居地、出生地、籍属迁徙变动等等还未足够重视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诸注未曾注意到司马相如“蜀郡成都人”,与出生地“巴郡安汉县人”之间的变化,也就完全可以理解。

二　梁代设立相如县的历史文化意义

郡县名称事非寻常,直接以人名作县名,古代有可靠记载的不过“不韦县”、“清丰县”、“相如县”等数例而已③,每一例都有具体原因。相如县的设立必然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。

比司马相如更有名、影响更大的大有人在,都不见作为县名,如孔子。至于东晋谢安,功劳盖世,以及南北朝各代功勋卓著者还有很多,也未曾以其名名县。也就是说,“相如县”之得名还有具体的特殊原因。以人物名县者古代绝少,“相如”县名是特殊环境下的政府行为。

首先是三国以来,由于各种原因郡县数量不断扩大。如《魏书·僭晋司马叡传》载:“(司马)叡割有扬、荆、梁三州之土,因其故地,分置十数州及诸郡县,郡县户口至有不满百者。”[16]2093根本的原因在于南北朝争战激烈,社会各方面动员、管理需要更为有力,特别是征发赋役,不容松懈,缩小行政区划势所必然。到南朝梁,这个趋势愈演愈烈。梁天监年间,分析州郡县涉及梁全境,相如县即在这个分析州郡县的运动中产生。

《隋书·地理志上·序》:“梁武帝除暴宁乱,奄有旧吴。天监十年,有州二十三,郡三百五十,县千二十二。其后务恢境宇,频事经略,开拓闽、越,克复淮浦,平俚洞,破牂柯,又以旧州遐阔,多有析置。”[2]807“遐阔”者不止州,“析置”者也包括郡县。西汉所设“安汉县”直到梁,地域仍然十分“遐阔”:“汉晋安汉县辖今南充、西充、蓬安、岳池、武胜等县地”[10]巴志,安汉县注一,96,相当于梁以后数郡之大。从地域“遐阔”的“安汉县”新分出一个县,这个新县境内有司马相如旧宅,所以就取名“相如县”,而相如县以后还一再被分析,其“遐阔”可以想见。

当然这种分析不仅南朝,故《资治通鉴·梁纪三》云:“是岁(天监十年),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,郡三百五十,县千二十二。是后州名浸多,废置离合,不可胜记。魏朝亦然。”[17]4601

因名人旧宅取县名,相如县尚非孤例。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“河北道”云:“清丰,大历七年,割顿丘、昌乐二县界四乡置。以县界有孝子张清丰门阙,魏州田承嗣请为县名。”[18]1495

以名人旧宅取乡、村地名的就更多。

相如县所属巴西郡地域,为南北朝争夺拉锯的焦点之一,其地利、人文特点北魏非常清楚,是必争之战略要地,如《魏书·邢峦列传》云:“又巴西、南郑相离一千四百,去州迢递,恆多生动。昔在南之日,以其统绾势难,故增立巴州,镇静夷獠,梁州借利,因而表罢。彼土民望,严、蒲、何、杨,非唯五三;族落虽在山居,而多有豪右。文学笺启,往往可观;冠带风流,亦为不少。但以去州既远,不能仕进;至于州纲,无由厕迹。巴境民豪,便是无梁州之分,是以郁怏,多生动静。比建议之始,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,克城以来,仍使行事。巴西广袤一千,户余四万,若彼立州,镇摄华獠,则大帖民情。从垫江已还,不复劳征,自为国有。世宗不从。又王足于涪城辄还,遂不定蜀。’”[16]1442《资治通鉴·梁纪三》系此于“天监四年”[17]4555。

“文学笺启,往往可观;冠带风流,亦为不少”是本地的人文特色,司马相如无疑是这个特色中最闪亮的部分,以“相如”名县自然有着激励地方人士的涵义。

对南朝梁来说,巴西郡地距北魏较近,在梁代不仅是巴蜀连通“江东”的必经之地,还是富于“军资”之土:“巴西郡居益州之半,又当东道冲要,刺史经过,军府远涉,多所穷匮。”[15]张齐传,282

“元起在道久,军粮乏绝。或说之曰‘蜀土政慢,民多诈疾,若检巴西一郡籍注,困而罚之,所获必厚。’元起然之。涪令李膺谏曰‘使君前有严敌,后无继援,山民始附,于我观德,若纠以刻薄,民必不堪,众心一离,虽悔无及,何必起疾,可以济师。膺请出图之,不患资粮不足也。’元起曰‘善,一以委卿。’膺退,率富民上军资米,俄得三万斛。”[15]邓元起传,199

分设相如等县的目的之一,正在于此“检巴西一郡籍注,所获必厚”。《资治通鉴》系此事“天监元年”。[17]4525

“天监四年二月……魏以(邢)峦为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巴西太守庞景民据郡不下,郡民严玄思聚众自称巴州刺史,附于魏,攻景民,斩之。”

“天监四年四月……冠军将军孔陵等将兵二万戍深杭,鲁方达戍南安,任僧褒等戍石同,以拒魏。刑峦遣统军王足将兵击之,所至皆捷,遂入剑阁。陵等退保梓潼,足又进击破之。梁州十四郡地,东西七百里,南北千里,皆入于魏。”

“天监四年冬十一月……魏王足围涪城,蜀人震恐,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,民自上名籍者五万余户。刑峦表于魏主,请乘胜取蜀。”

“(天监十三年冬,十月)辛亥,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、平蜀大都督,将步骑十五万寇益州;命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,梁州刺史羊祉出涪城,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,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。”

“天监十四年冬……葭萌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,杀魏晋寿太守,以城来降,民、獠多应之;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将兵三万迎之。”[17]4548,4549,4552,4608,4620

可见相如等县地域是严酷的南北拉锯前沿之一,是梁在北魏强大军事压力下设置的。

巴西一带自汉代以来,始终“文学笺启,往往可观;冠带风流,亦为不少”,这个特点在当时既然特别为北方所注意,南朝梁新县以“相如”为名,就能很贴切体现当地人文发展水平,作为文化发展的区域性标志,在南北激烈争夺中体现一种文化宣传的特殊作用,正如此时南北朝皆加封孔子后人的做法一样。

正统、正朔、礼乐、冠带、诗赋文辞是文化争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三国以来文章诗赋在社会生活、个人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强化,到梁代达到一个高峰,在梁和北朝相争中也是一个有用的武器。这是相如县命名的第二个基础。

正统既是政治的宗法的概念,也是文化的概念,二者互为表里。正统之争体现在政治、外交、文化各个方面,而核心在于礼乐教化、诗赋文辞等深层的文化成就中,南北朝正统之争实质上就是文化之争,在思想上、舆论上证明自己的先进性、合法性,从而争取人心,稳固统治,是与军事相配合的斗争手段。南北朝时期直到梁代,南朝在争夺正统地位的斗争中基本上是处于优势的。从东晋以来至梁,南北方之间军事实力大体相当,正统、正朔、礼乐、冠带、诗赋文辞的高下就成为争论的着力点,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,正统、正朔、礼乐、冠带、诗赋文辞之争才有现实意义,而在这个方面,南朝的礼乐、文教、诗赋文辞就成为这个争夺中的砝码,也是正统优势的根本来源。至于侯景之乱以后,“疆埸日蹙”[19]傅縡传附章华传,1687,南朝正统失去现实基础,这种努力就只有一点自我安慰的意义了。

梁天监年间,南北拉锯战十分剧烈,正是势均力敌,南北正统之争、文化之争也十分剧烈。梁代礼乐、文章繁荣达到南北朝顶点,是文化史、文学史自身发展的结果,也是梁与北朝相争的重要资本,这甚至令对手忧心忡忡。《北齐书·杜弼传》载:“高祖曰:‘(杜)弼来,我语尔。天下浊乱,习俗已久。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,黑獭常相招诱,人情去留未定。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,专事衣冠礼乐,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。我若急作法网,不相饶借,恐督将尽投黑獭,士子悉奔萧衍,则人物流散,何以为国?尔宜少待,吾不忘之。’”[20]347

南、北朝诗赋文辞在双方的日常生活中都成为珍品,互相以礼乐文章夸耀自己、贬辱对方的记载在此时的史籍中比比皆是。新设县能够以“辞宗”之名命名,符合梁朝一贯作为。当然司马相如在南北朝时期的影响能不能达到可以夸耀对手、鼓励地方的程度,还要看当时对他的具体评价。

两汉文章,以华彩而言,司马相如显然属于标志人物。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评价司马相如文章核心在于“靡丽多夸”[3]3317。扬雄也是如此认识。《汉书

·扬雄传上》云："先是时，蜀有司马相如，作赋甚弘丽温雅，雄心壮之，每作赋，常拟之以为式。又怪屈原文过相如。……辞莫丽于相如。"[4]3515 东汉班固亦云："文艳用寡，子虚乌有，寓言淫丽，托风终始，见识博物，有可观采，蔚为辞宗，赋颂之首。述《司马相如传》第二十七。"[4]叙传下,4255

"辞宗"一词，为班固首创。言相如为"赋颂之首"，以"辞宗"誉相如，即是肯定其文辞在两汉的影响属于第一位。

魏晋以来至于梁代，司马相如的作品是评论文章成就的通用标准。因为魏晋至于南朝，华丽是文章审美意味的基本尺度之一，从此上溯，"辞莫丽于相如"，其"辞宗"地位仍然保持着。

比较而言，司马相如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两汉还有提高，不但是以文章辞赋著名的人物中被谈论描写最多的对象，而且还被看作是高尚的"贤士"之一，为南北方文士歌咏。

1. 与屈原同列。

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云："或问屈原、相如之赋孰愈？曰'优游案衍，屈原之尚也；穷侈极妙，相如之长也。然原据托譬喻，其意周旋，绰有余度矣。长卿、子云意未能及已。'"[21]全三国文,1096

2. 衡文标准。

曹植云："以孔璋之才，不闲于辞赋，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，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。"[21]全三国文,1140

左思《咏史诗》云："言论准宣尼，辞赋拟相如。悠悠百世後，英名擅八区。"[23]733

常璩云："长卿彬彬，文为世矩。"[10]先贤士女总赞,712

刘勰也称司马相如为"辞宗"[22]风骨,才略,1057,1777，《文心雕龙》谈到司马相如约20处。

3. 高尚贤士。

嵇康《圣贤高士传》云："长卿慢世，越礼自放。犊鼻居市，不耻其状。托疾避患，蔑此卿相。乃赋大人，超然莫尚。"[21]全三国文,1344

鲍照《蜀四贤咏》云："相如达生旨。能屯复能跃。陵令无人事。毫墨时洒落。"[23]1294

常景《赞四君诗·司马相如赞》："长卿有艳才，直致不群性。郁若春烟举，皎如秋月映。游梁虽好仁，仕汉常称病。清贞非我事，穷达委天命。"[23]2219

《世说新语》及刘孝标注也录有多条关于司马相如的评论、文辞。

4. 梁帝王的关注。

梁武帝天监初所作《手敕答张率》云："省赋殊佳，相如工而不敏，枚皋速而不工，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。"[15]张率传,475

太子萧统《答晋安王书》："相如奏赋，孔璋呈檄；曹刘异代，并号知音。"[21]全梁文,3064

司马相如具备古代文人所有基本特征，集许多矛盾于一体，生平事迹富于戏剧性，属于极富华彩人物，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极好的谈资，《西京杂记》所载就多达十余条[25]第79册。查考此时史籍，司马相如无疑是汉以来古人被谈论最多的文士。在其故乡巴蜀之内，也是逸闻流传不绝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秦宓传》载宓有为相如"立祠"之议[12]973，《张裔传》又有裔与孙权关于卓文君"亡奔"相如的斗嘴[12]1012，《华阳国志·蜀志·蜀郡州治》还有相如"赤车驷马"的传说[10]227，皆是证明。

司马相如作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"辞宗"，具备足够称许夸耀于北方的影响力。

又，古代对郡县、官爵等等名称相当重视。《晋书·地理志上》云："刘备章武元年，亦以郡国封建诸王，或遥采嘉名，不由检土地所出。其户二十万九十万。孙权赤乌五年，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。"[13]414《南齐书·张瓌传》云："即授辅国将军吴郡太守，封瑰义成县侯，邑千户。（齐）太祖故以嘉名锡之。"[26]454《南史·齐高帝诸子传》云："武帝幸之，置酒为乐，顾临川王映：'王邸亦有嘉名不？'[19]1082《梁书·孝行传》云："（江）蒨乃因智者启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，乞赐嘉名。敕答云'纯臣孝子，往往感应。晋世颜含，遂见冥中送药。近见智者，知卿第二息感梦，云饮慧眼水。慧眼则是五眼之一号，若欲造寺，可以慧眼为名。'"[15]656《北史·陈元康传》云："（北魏）别封昌国县公，以从嘉名。"[27]陈元康传,984

北朝皇帝赏赐臣下的嘉名不计其数。

南北朝双方都曾把州郡县名称作为宣传战以及正统正朔的依据之一，"侨州郡县"、"遥领"等等也蕴含着相当的对抗争论意味。以梁天监年间相如县地域作为战略要地所取县名一事，与以上诸嘉名故事比较，也必当具有同样的涵义。

综上可知，此时以相如名此县，即具有巩固边防、强化郡县管理的历史作用，又具有夸耀礼乐文雅、激励本地人士的文化意义；既有南北文化争衡的

现实要求,又是地方文史传统长期发展的标识;既取义于朝廷意志,又寄予着地方希望。所以,梁代取相如县名,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嘉名。梁以来天下县名多经改易,如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下》云:“丙寅,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。[18]215而相如县名历八百余年未曾改易,即说明梁代相如县命名的涵义完全正确,被后代所长期接受。

注释:

①“刘知几所读到的《司马相如集》中确有其《自叙》”,此《自叙》是否是司马相如本人所作,尚有疑问,或以为是编纂者撮取本传而成。但此《自叙》与司马相如本人曾有否《自叙》是两个问题,不影响《史记》在这一点采录自司马相如“自叙”资料的推论。

②这一条究竟指司马谈还是司马迁,尚有争议,但无论是指太史公司马氏父与子,司马迁当时居住地、编户地在此无疑。

③不韦县,《三国志·蜀书·董刘马陈董吕传》卷四三,裴注引孙盛《蜀世谱》曰:“初,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於蜀汉。汉武帝时,开西南夷,置郡县,徙吕氏以充之,因曰‘不韦县’。”又见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·永昌郡》“孝武时…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,因名‘不韦’,以彰其先人之恶”。清丰县,见《旧唐书·地理志二·河北道条》卷三九“以县界有孝子张清丰门阙,魏州田承嗣请为县名”,又见《新唐书·地理志三》。

参考文献:

[1]赵正铭. 邓郁章. 相如故里在蓬安[M]. 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1.
[2]魏征. 隋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[3]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[4]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[5]李大明. 司马相如生于蓬安[J]. 光明日报. 2004-12-31.
[6]刘知几. 史通[M]. 四库全书本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[7]何兹全.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:第3卷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01.
[8]张清常,王延栋笺注. 战国策[M]. 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87年.
[9]吴越春秋[M]. 四库全书本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[10]刘琳. 华阳国志校注[M]. 成都:巴蜀书社,1984.
[11]任乃强.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.
[12]陈寿. 三国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[13]房玄龄. 晋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[14]范晔. 后汉书[M]. 十三经注疏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[15]姚思廉. 梁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[16]魏收. 魏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[17]司马光. 资治通鉴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[18]刘昫. 旧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[19]李延寿. 南史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[20]李百药. 北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2.
[21]严可均.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[22]詹锳. 文心雕龙义证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.
[23]逯钦立.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[24]林贞爱. 扬雄集校注[M]. 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1.
[25]西京杂记[M]. 四部丛刊初编. 上海:上海书店,1989.
[26]萧子显. 南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2.
[27]李延寿. 北史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
[责任编辑:李大明]